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学派的 经济政策主张：孰优孰劣？

傅 殷 才

当代西方经济学各学派，为了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出谋献策，提出了各自的经济政策主张，其中最主要的最有影响的有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它们相互攻讦，莫不大夸自己的经济政策能拯救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无危机地、不断地迅速发展。真如“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对这些主要学派的经济政策进行认真研究，考察一下它们孰优孰劣的问题，看看其中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利用的，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无疑是很重要的。

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年)。他的经济政策主张的出发点，是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失业和经济危机，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具有自动调节的能力，靠自由放任、自由竞争，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这些“弊病”。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失业和危机的原因，在于市场上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构成的。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消费者对于消费的心理倾向的作用，即由于消费倾向偏低所造成的，这就是“消费倾向”规律。投资需求不足，是由于利润率和利率的失调所引起的。利率决定于货币资本家对于流动性的心理态度，即利率的高低取决于流动性偏好的强弱与货币数量的多寡，凯恩斯认为，人们出于种种动机，主要出于投机动机，想用货币形式来保持其一部分财富。这种由于货币具有流动性而引起人们的偏好，称之为流动偏好。当货币的供给量不变时，利率由货币需求(流动偏好)来决定，这就是“流动偏好”规律。利润率(指预期利润率，即凯恩斯所说的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产业资本家对资本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在凯恩斯看来，资本边际效率所以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投资物产量增加时，生产设备所受的压力加大，因而成本会提高；但从长期看，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投资物的供给增加时，资本家预计将来各个时期从它得到的收益将会下降。这样，私人投资的诱力越来越弱，从而影响投资需求的减弱，这就是“资本边际效率”规律。

凯恩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这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单纯依靠私营经济的市场自动调节，有效需求总是不足，不可能保证社会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 and 消灭经济危机；要作到这些，只有靠国家对经济进行直接的干预或调节，否则，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崩溃。他写道：“……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

用。”^①可见，在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中，最本质之点就是主张国家调节经济，干预经济生活，也就是主张发展和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凯恩斯及其门徒，根据上述基本观点，以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达到“充分就业”为目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

1. 在影响“消费倾向”方面，主要强调增加消费以促进对消费品的需求，包括提倡奢侈浪费，而反对节省。凯恩斯曾经说过：一个国家如果喜欢奢侈浪费，那个国家的生产发展和文化程度都一定很高。现代人不及古埃及人幸福，因为他们有两种活动：建筑金字塔和寻找贵金属。现代人也不及中世纪人，因为他们修建了礼拜堂。我们太经济了，结果难逃失业的痛苦。^②他甚至写道：“如果政治家因为受经典学派经济学之薰染太深，想不出更好办法，则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③不过，凯恩斯也表示希望财产不均的现象有所缓和，因为富裕的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他写道：“就我本人而论，我相信的确有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可是不均现象今日那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④因此，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来缩小收入分配不均的幅度，以便增加消费支出，提高就业水平。

2. 在影响“流动偏好”方面，主张扩大货币发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以降低利率和实际工资，刺激私人投资。凯恩斯非常重视利率的作用，认为维持低利率是保证经营积极性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既能刺激消费，又能刺激投资，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他强调说：“失业问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人们要造空中楼阁——如果人民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不能生产，而对此东西之需求又不容易压制，劳力便无法就业。唯一补救之道，只有要公众相信：纸币也是货币，而由政府来统制纸币工厂，换句话说，由政府来统制中央银行。”^⑤他还认为，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可以压低实际工资，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使资本家愿意增加投资，雇用更多的工人。

3. 在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方面，主张扩大政府支出，举办公共工程，以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凯恩斯写道：“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之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⑥这就是说，增加就业只能主要靠政府投资。但他认为，政府不应投资于生产事业，以免同资本家发生竞争，也不宜投资于社会福利事业，因为这可能影响资本家的利润，牵涉到收入分配问题。因此，他强调的是公共工程。而且他还认为，不应采取增征所得税的办法增加政府收入来进行投资，因为这将缩小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两者互相抵销，有效需求仍然不足。因此，不应采取增加政府收入以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而应采取“举债支出”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赤字财政政策。

以上是凯恩斯学派在国内的基本经济政策。大家知道：凯恩斯的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说明的是“封闭社会”，不涉及对外经济关系。但是，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同样可以应用到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他自己就曾说过：在某一时期如果存在大量失业现象，但工资水平不易改变，流动偏好也相当稳定，银行又墨守成规，“当局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之其他引诱，则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⑦基于这种观点，凯恩斯本人及其门徒采取了与传统自由贸易政策完全不同的政策，即就是主张政府干预，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1936年《通论》出版算起），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赤字财政

政策、通货膨胀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对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内外经济政策，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可是，到了7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国家相继开始或多或少地抛弃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政策，实行与之相反的政策。

现代货币学派 的经济政策主张

现代货币学派的领袖和主要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现代货币学派继承芝加哥传统，是属于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还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弗莱堡学派等^⑧，其中现代货币学派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而且日益得势，英、美等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现代货币学派的政策。现代货币学派经济政策主张的出发点则是信赖市场供求的自动调节作用，主张自由放任，以达到经济均衡发展。在现代货币学派看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高度稳定的、最能进行自我调整的制度，它处于有节奏的、均衡增长的自然状态中，存在无危机发展和增长的内在潜力，用不着国家进行干预或调节。弗里德曼认为，政府除了“为竞争的规则提供一个货币的结构”以外，听任人们自行其是，不再进行干预，自由企业经济就能在稳定状态中得到发展。

但是，在当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不干预经济是不可能的，现代货币学派虽然竭力反对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干预政策，但并非要完全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不过要改变国家调节的规模和形式而已。现代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尽量少干预，鼓吹货币最要紧，在货币上大作文章。具体地说，现代货币学派坚决反对政府的财政干预，只提出了与货币有关的政策主张。而这里所说的主张，实际上是不要用货币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因为他们认为，货币的不稳定和采取任何调节的政策，都会造成经济的波动和起破坏性作用，因此，政府只要保持货币“固定不变的增长率”就够了。

弗里德曼从信赖市场供求的自动调节作用出发，认为一切经济动荡的根源在于政府错误的干预，要加以纠正，必须彻底摒弃财政政策，为私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稳定的货币体系。他与凯恩斯学派不同，一贯坚持“唯有货币要紧”的观点，早在1956年，他就说过，他所遵循的芝加哥传统，“就是坚持货币至关重要这样一种理论研究方法——如果忽视货币的变动和反应，如果对人们为什么愿意单单保持现有的名目货币量不加以阐明，那么对经济活动的短期动向的任何解释就会如坠五里雾中”^⑨。他用货币供应量来说明和解决物价、通货膨胀等问题。他写道：“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⑩，“如果货币量的增长，不快于产量的增长，那就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⑪，“假如你要控制物价和收入，货币供应就提供杠杆”^⑫。

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学派并不是不重视货币的作用，他们认为货币也要紧。但在他们看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并使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内可以有较大幅度的摆动，是为了调节投资量。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利率的调整，企图以此影响利润率，从而影响投资量。即提高利率，使投资紧缩；降低利率，使投资扩大。为此，就需要采取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调整中央银行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卖出政府债券，以及改变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比率等措施，来影响利率水平。总之，凯恩斯学派不象现代货币学派那样认为货币量的变动与物价水平有直接的关系，而认为要首先通过流动偏好影响利率，然后对物价水平的变动产生间接的影响。

而现代货币学派则认为，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目的，不在于控制总需求水平，而在于使市场上商品和劳务数量的增减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相适应，以便稳定物价。因此，在短期内不应使货币供应量有很大的变化，否则，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他们还认为，利率是政府所不

能也不应控制的因素,它取决于政府控制的金融范围以外的其他许多经济因素(如价格预期),若政府把控制利率作为目标,只会加剧货币供应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剧市场经济的动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可行的,是为私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

按照弗里德曼的解释,所谓“稳定的货币体系”,就是币值稳定、处于良好运转状态的货币体系,也就是能够保证物价稳定的货币体系。怎样才能提供“稳定的货币体系”呢?在现代货币学派看来,这就是政府控制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同经济增长率大致相适应。弗里德曼建议美国货币供应量应按每年4—5%的固定增长率有计划地增长,而不应随意调整,认为这样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这就是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单一规则”(“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他所以规定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固定增长率为4—5%,这是因为,在美国,从过去一百年产量和劳动力平均增长率来看,美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不可能超过4%,这大致需要增长货币3—4%;美国劳动力增长率平均为1—2%,这又需要每年增加货币1—2%。如果美国货币供应量按每年增加4—5%的速度增长,就可以同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从而可以保证物价稳定,经济增长。

可见,弗里德曼的经济政策主张何等简单!突出货币供应量的作用,把这看成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只要按“单一规则”行事,就万事大吉。

新制度学派的主张 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他也是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但在干预的范围、内容和方法上与凯恩斯学派有很大不同。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因而这个学派主要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用演进来说明社会变动,从结构变化方面推测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认为资本主义的“缺陷”在于制度结构的失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挽救和医治资本主义的各种政策建议。

战后,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及其他矛盾的激化,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干预方法、干预范围与干预程度,加尔布雷思的构造改革理论和政策正是反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结构性调整的客观需要,不过,加尔布雷思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似乎比较“激进”,实际上仍然旨在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些政策建议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 调整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组成的“二元系统”。在美国,“计划系统”由一千家左右的大公司组成,它有计划地经营、生产和销售,拥有操纵价格的权力,它消灭了贫困,已经没有阶级对立,其权力掌握在技术和管理人员手中,公司的目标不是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而是稳定和增长。“市场系统”则约由1,200万个中小商号(包括农场、服务性企业、零售店、建筑业、小型制造业等)所组成,它的特点是使用比较简陋的技术,市场关系占统治地位,这些中小商号力量单薄,无权控制价格,不能支配消费者,而受市场力量的支配和“计划系统”的盘剥。加尔布雷思表示同情“市场系统”的处境,主张国家进行干预,提高市场系统的地位和扩大它的权力,抑制计划系统的权力,消除它对市场系统的剥削,使这两个系统的权力和收入“均等化”。这一点是加尔布雷思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所以他强调说:“首先需要积极提高市场系统的权力和能力,提高它与计划系统相对下的发展程度,从而从这一方面开始,缩减这两个系统之间在发展方面一贯存在的不均衡状态。这里应采取的步骤是,从事缩减两个系统收益的不均等,提高市场系统的谈判力量,减少计划系统对它的剥削。我们把这个叫作‘新社会主

义’”。^⑬

2. 调节总需求。加尔布雷思承认美国经济中存在危机和失业的趋势，认为调节总需求对消除失业是必要的。在他看来，储蓄与投资不协调会引起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只有通过国家的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保证经济的均衡发展。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他反对把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同经济军事化、军备竞赛连在一起，主张停止军备竞赛，建议在征服外层空间等方面进行竞赛，认为这样能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并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使人类免于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的威胁。

3. 控制工资与物价。加尔布雷思非常重视物价与工资的作用。他说，在近代，“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除了价格和收入是怎样确定之外，并没有多少别的内容”。^⑭在他看来，“计划系统”中工资和物价不断加剧的螺旋上升倾向是现代社会通货膨胀持续不已的原因，这不能靠增加失业来抑制收入和物价的上涨，而必须靠国家直接干预，即实行收入、价格政策。他强调说，“我坚信，如果不对工资与物价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控制，现代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下去。想实行一种不对工资和物价进行控制的经济政策的人，可以说对现代组织重要性不理解。”^⑮

4. 实行计划化和某些企业的国有化。新制度学派认为，国家计划不仅是为私人企业提供情报、协调私人公司的活动、防止比例严重失调的工具，而且是开发经济资源、管理科学技术、影响生产和消费结构，使之相互协调的一种措施；认为计划是国有经济部门存在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是提高其效率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加尔布雷思非常重视计划化，不仅认为现代公司能够实行计划化，因为它们不受市场调节作用的支配，而且认为国家也可以实行计划化。同时，他还主张某些企业首先是军事企业的国有化，用以反对经济军事化和军国主义。

5. 增加人力投资，发展科学技术。加尔布雷思从各方面论证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说：“经济发展取决于控制技术和资源的力量，取决于创造革新和采用革新。”^⑯因此，他认为，应当增加对人的投资，“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这种投资变得愈来愈重要”，“考验不在我们的物质投资的有效程度，而在我们对人的投资的有效与否”，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因为新技术的发展和采用，需要有创造和驾驭它的专门人才。而且增加“人力投资”，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与培训，也是解决失业的办法，因为在他看来，失业的原因还在于技术迅速发展，迫切需要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而教育制度落后，人力投资少，致使没有技术的人遭受失业，而需要技术工人的部门存在着空缺。他认为，现在是把太多的投资放在财物上，而不是把足够的投资放在人身上。他主张改善教育制度，要求投资于“人”的数量，要赶上投资于“物”的数量。

此外，加尔布雷思还提出了同环境污染作斗争，提高和改善妇女的地位，扶助小企业和个体经营等一系列主张。

总之，加尔布雷思经济政策主张的中心思想是要使不完善的经济结构变得完善起来，使“公共目标”即“公众的利益”或“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要”受到政府的重视，使权力和收入分配均衡化，资本主义得以稳定地发展。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已如上述，它们的效应究竟如何呢？首先，我们还是看看西方经济学家自己的评论吧：在著名的英国凯恩斯主义者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03—1983年)看来，经济理论未能提出有效的决策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这是“经济理论的明显破产，即是，除经济学家外，对谁都显得最需要给予回答的问题，这种理论再次无言以对”^⑰。

在美国贝尔(Daniel Bell)和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教授编的论文集《经济理论的危机》中甚至说:“当前的经济学确实有点处于象一条死胡同那样的情况。占支配地位的‘科学的’模型趋向于进一步远离经济现实,从而为经济政策作出的推论更加含糊不清和令人困惑。”^⑩在谈到凯恩斯学派时,这本论文集写道:“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全盛时期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应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重大政策失败负责。他们提供的意见和建议经证明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预测不准确,而且因为他们忽视了政策的长期效果,也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他们微调经济的能力。”^⑪至于现代货币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势不久,褒少贬多,新制度学派还处于异端地位,各国政府尚未认真看待它们的政策主张。诚然,这些学派提出的政策,虽然有的可能在这一时期对这一国家的“经济病”有一定疗效,有的在那一时期对另一国家的经济起一定作用,但总的说来,无论哪一经济学派的经济政策都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等资本主义痼疾。因此,这里谈不上现代货币学派和新制度学派“超过”凯恩斯学派的问题,也谈不上现代货币学派“超过”或“逊于”新制度学派的问题。这就告诉我们,在研究西方经济学时不能匍匐在它的面前,也不能迷恋于它的某一学派,即使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府,虽然在某一时期信奉某一学派,但并不绝对皈依这一学派,而是博采众长。

不过,某些西方经济学家确在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探索,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提出了可行的和有效的方案,而且有些人并不意识到这是在维护帝国主义制度,这正如西方自然科学家研制了核武器,并不知道这是为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效劳一样。西方经济学各学派在各自的领域作了深刻的研究,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凯恩斯学派把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放在首要地位,现代货币学派把发挥自由竞争、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作为基本原则,而新制度学派则把结构调整看作改革社会最重要的手段。他们在提出政策主张时莫不从资本主义这样的实际出发: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从前一方面看,是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从后一方面看,则是有一定的共同性。由此可以作出结论,我们在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主张时,要加以分析批判,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特点,择其适者而反之。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我们搞现代化,进行改革,不仅要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向它们学习管理现代经济的理论、政策和措施中有用的东西。资产阶级经营管理大生产经济有了很长的历史,在国家干预和利用市场机制方面有过不少失误,也有许多成就,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它们的政策也在不断完善,资本主义所以仍然存在,甚至在个别时期里迅速地发展,这也许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发挥国家的经济职能,也要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些方面的某些政策主张,是可以借鉴的。

凯恩斯学派强调国家干预,反对那种听任市场机制盲目发挥作用的观点和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特别是这个学派中的新古典综合派主要关心的是维持经济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增长,把经济增长速度提到第一位,因而比较着重数量方面的分析,比较注意经济管理,经济效益以及这些方面的政策效应;这个学派中的新剑桥派则着重于通过累进税以改善现存的收入分配,给予低收入家庭以适当的补助;把政府掌握的资源从军事部门转到民用和服务部门;提高失业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预算;实施进口管制,发展可以为国内提供较多工作岗位的出口品生产;反对滥用生产资源,防止环境污染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所应当注意的,而且应当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得更好,这就有一个借鉴的问题,取其长而避其短。

现代货币学派充分信赖和尽力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减少国家干预，调整国家干预的内容和方向，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地发生作用，因为他们有鉴于凯恩斯学派对国家干预强调过度，妨碍了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作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和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年)“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开始算起，已经两个多世纪了，在此期间，他们总结和丰富了这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弗里德曼不仅总结了历史经验，而且考虑到了当代现实，纠正西方“时弊”起了一定作用。在我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曾经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现在的研究和认识也很不够，这就需要认真学习、借鉴新自由主义包括现代货币学派在内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

新制度学派提出的一系列改良主义政策和措施，如国有化、计划化、收入均等化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必然要实现的。加尔布雷思所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虽不被资产阶级政府所采纳或暂时没有被重视，就不见得对我们也没有意义，不值得研究。

总之，我们不应当闭关自守，固步自封，而应当研究西方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但不同的经济政策是以不同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分析一般只是理论研究的延伸或应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对了解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极为重要的，因此，首先应当重视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把理论与政策的研究结合起来。不言而喻，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其目的是为垄断资本家攫取最大限度利润，剥削和掠夺劳动人民。因此，他们的基本理论不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他们用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不能成为我国的发展模式。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政策主张，而应当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对他们的理论和政策采取分析的态度，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利用其有用的个别成份，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3—324、111、109—110、318、198、321、285—286页。

⑧ 供给学派曾名噪一时，但作为独树一帜的学派已经衰落，现在已不大为西方理论界所重视。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学派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这个学派主张无为而治，未提出什么值得注意的政策主张，至于弗莱堡学派，基本出发点也与货币学派相似，其影响主要在联邦德国，因此，对它们不作分析。

⑨ 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研究》，1956年，芝加哥，第233页。

⑩ 弗里德曼：《什么价格指导线》，载舒尔茨和阿利伯编：《指导线、非正式管制和市场》，196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18页。

⑪ 弗里德曼：《论货币》，《世界经济译丛》，1981年第5期，第29页。

⑫ 弗里德曼：《货币最优量和其他论文》，英文版，第170、179页。

⑬⑭⑮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7—218、113、256页。

⑯ 加尔布雷思：《不肯定的时代与世界经济》，载《世界经济译丛》，1980年第5期第14—15页。

⑰ 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第17页。

⑱⑲ [美]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56页。